

一九八三年九月，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提笔挥毫：“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对全国各族的广大师生是一种最大的鼓舞，他给我们指出了社会主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向，又对各级学校培养又红又专的创造型人才提出了最新的要求。“三个面向”的贯彻和实施，必将使我国的教育事业为振兴中华作出更新、更大的贡献。总之，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将使中华民族以最快的速度在世界上崛起和腾飞。

在建国三十五周年的庆祝典礼上，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再一次强调：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这对我们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又是一次殷切的期望和号召。确实，从我们国家的教育现状来看，无论从教育体制、教育结构、办学指导思想、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改革，才能符合四化建设的需要。事实上，教育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并不只是局限于我们一个国家，而是遍及全世界的所有各国。如何面对新的挑战？专家们所设想的对策当然很多，但是归根到底，就在于人才的培养，就在于实施新的教育。因此，国内外的有识之士都有共同的认识和见解，即：未来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实质上就是教育的竞争。谁重视教育，谁就有未来；谁重视了教育改革，谁就能抓住了时机使国家民族兴旺发达。

因此，在“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指导下，改革教育，培养人才，振兴中华，就是历史赋予给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南宋诗人陆游写过“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诗句，清代学者顾炎武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那末，我们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更当自觉地从实际出发，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在讲求实效中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更好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在今天，放眼世界和了解国外的信息就显得十分重要，请看，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乔治对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作了深入的研究，因而推崇备至，他特地撰文又十分赞赏地向人们推荐：“你想成为第一流的管理人才吗？那就必须去读读中国的《孙子兵法》。”日本的管理学界中目前出现了“孙子兵法学派”。可见，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遗产宝库中确有许多值得人们学习的精华。就我们从研究教育史方面来说，正如《中国教育报》在一篇题为《改革教育 迎接教育事业光辉灿烂的未来》的社论中写道：“我们有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也有旧中国的教育经验，特别是有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教育经验。对这些经验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因此，我们多么需要对中国近现代的教育史加以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时期各派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的研究，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需要，以便从中吸取精华，作为借鉴。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周谷城教授语重心长地指出：从“五四”运动至今，我们教育工作者培养了那么多人才，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战士和各种建设人才，也培养了不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专家、学者。这里就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蕴

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问题是，从整体来看，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比较分散，散见于他们各自的实践、经历之中，缺乏综合和系统深入的研究，没有形成有我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周谷城教授又进一步阐述：中国现代教育史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这一点至今尚未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我们对现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非常不够……（详见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人民日报》）周老的卓越高见，正是说出了史学界前辈们早想说明的肺腑之言，记得在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于一九八三年在成都举行的第三次学术会议期间，几位老前辈和一些同行们曾经鼓励我写一本《中国近现代各派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简史》的集子，以供作师范院校和教育学院、教师进修院校各系、科、专业教学法课程的公共自学读物（李政道教授认为真正的学习本质就在于自学）。因为分科教学法的课程只突出和局限于本专业的个性，可是教学实践证明，它却需要有共性的自学读物作为辅助，才能真正有效地提高分科教学法的教学质量，何况全国共有高师院校五百多所，再加上在职的广大中小学和中等师范学校的教师也同样需要这方面的参考资料作为借鉴和研究，于是，我就鼓起勇气将自己多年来所积累的资料加以整理、研究并动笔写稿。时隔一年之后，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于一九八四年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学术会议时，几位老前辈和同行们再次对我加以鼓励和催促，同时，上海教育学院张家祥院长在大会发言中也一再强调：“教育学院应把教学法的地位提得很高，……把教学法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上，我们教育学院

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贡献。”于是，我就把已经写成的在中国近现代史时期的十位著名教育家——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陶行知、毛泽东、徐特立、吴玉章、竺可桢、程今吾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先合成一本集子，对每位教育家的成就与贡献和国际上同时代的教育家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比较探讨，以向行家们求教。当然，在中国近现代史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何止以上十位，实际上，在我国近现代教育界的明星巨匠和大师，至少在几十位以上，甚至可达百把人之多，他们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各有真知灼见。但是，限于时间、精力和水平，只能先以这本小集子作为抛砖引玉，以求前辈和同行们有更具丰富内容和更高研究水平的专著早日问世。

《中国教育报》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在改革中迎接新学年》的社论中特别强调：“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指出，要重视教学方法的改革，要提高学生的能力。这一指示切中时弊。”因此，我们除了要注意吸收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之外，更有必要批判性地继承和发扬我国著名教育家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方法。吉林大学张松如副校长说得好：“起点在历史与现实之纵横交叉处，现实决定目标，历史指示方向。”是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沿着前人走过的道路上继续进行探索和开拓的创造中前进，前人开拓了万古洪荒，后人创造了新的世界；前人走过的足迹之处，变成了后人步伐的起点而勇往直前。那么，整部教育史，也同样是按照这个发展过程在前进着，在创造中。因此，总结和研究前人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对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确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近代史上，鲁迅先生可以说是最重视研究教学法的一位名家，他曾经在一九三三年写的《准风月谈·我们是怎样教育儿童的？》一文中写道：“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这是鲁迅先生在大力鼓励和高度评价人们去写教学方法史的重要性。确实，凡是炎黄子孙，不论身居祖国大地的东西南北，或是侨居异国他乡的天涯海角，大家的内心里多么深切地希望了解祖国教育史中的辉煌篇章，并以此引为中华民族的自豪。因此，谨将这本小小的集子，献给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也献给任教和研究各科教学法的同志以及学习各科教学法的青年朋友们。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杭州大学历史系王正平副教授的指导，使我深受教益。应当提及，我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中小学历史教学法》一书，曾经也得到他的帮助和指教，在此一并致以深谢！

同样使我铭记在心的是，我院的领导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再加上我院任教各学科教学法的老师和其他的同志们时时给予我许多温暖和勉励，得能使这本集子及早地完稿，使我的内心里永远表示深深的感激！

必须着重说明，毕竟是限于自己的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书中不免既有缺点，也有错误，敬请前辈、专家、同行和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万分感谢！

作者 于杭州教育学院

目 录

第一编	中国近代史时期各派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研究
一、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7)
二、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30)
三、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44)
四、	鲁 迅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67)
五、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76)
第二编	中国现代史时期各派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研究
一、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108)
二、	徐特立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135)
三、	吴玉章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153)
四、	竺可桢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169)
五、	程今吾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180)

第一编 中国近代史时期各派 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研究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后易号更生、更牲，晚号天游化人。清朝进士。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康南海先生诗集》等。

当我们研究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的过程中，更加使人想起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反复说过的一句名言：“熟知并非真知”。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著作中对这句名言有过高度的评价和重视。黑格尔曾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是的，人们都熟悉康有为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重要首领和主要代表，后来却成为复辟帝制的保皇派人物，晚节不佳，似成定论。但是，对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恐怕还没有被世人所真知。

康有为出生在广东南海，一个历史人物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对其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往往具有一定的以至重大的影响。康有为出生的时间，又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爱璦条约》和《天津条约》的1858年，逝世于第一次国内

革命战争失败的1927年。他似乎生不逢辰，但从促成他思想发展的这一角度上来说，又可说是生得其时。这个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曾经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艰难岁月，经过千辛万苦的曲折奋斗，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找真理，他不愧为“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尤其是他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曾经在中国近代史时期产生过重大的作用，并留下深远的影响。我们应当公正地说，康有为是一位中国近代史时期具有卓越远见和崇高教育理想并努力从事改良主义教育实践的著名教育家

众所周知，今天的北京大学，它的前身就是京师大学堂，这是戊戌变法运动的直接产物。可以设想，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得能出现一所近代化的高等学府，实在是一件空前的壮举。尽管流光易逝，却始终不能磨灭康有为教育思想的光辉纪录。因为，京师大学堂的诞生，就是康有为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持废科举、兴学校的重大成果。

任何一个教育家所创立的各种教学方法，既是他本人教育思想的直接反映，又是教学实践的具体产物。

一、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教育是国家的富强之本。重视德育教育，提倡体育教育，强调智育教育必须结合德育教育。

康有为在一系列论教育的著作中，着重提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中心思想：教育是国家的富强之本。他曾经反复地强调，教育是人的善恶智愚决定性的重大因素。因此，他就坚定地主张用教育的力量来培养人才，以人才去改良国家的政治，唯有政治改良才能改变中国的贫穷和落后状态，从而使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上富强之路。这是康有为教育思想的

出发点，也是归宿点。无疑，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晚期所形成的教育思想，具有顺应历史潮流的先进性。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一部重要代表作。在《大同书》里，康有为突出了教育的地位，强调了教育的作用，他明确指出：“大同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事实上，康有为所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观其全局，就是运用了教育的力量，无论组织学会，或是创办报刊，更是设立学校，都是依靠教育来培养维新变法的力量，从而去争取变法维新的实现。

应当提及，康有为十分重视教育并突出教育的重大作用，在他《上清帝第二书》中也作了充分的表达，他曾经写道：“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穷理劝学的教育就可以培养出大批“人智之士”，因而康有为断言：“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由此，他就非常痛心地感叹：“中国之如此衰弱，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良好的教育。”所以他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的时候就大声呼吁：“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因此，康有为就坚决主张：“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

有人说，康有为的教育思想终究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是的，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过，首先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的是：革命和改良之间究竟有什么辩证关系？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就是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这个真理。列宁在《反对帝制》的论文中指出：君主立宪的道路，“一点也不排斥革命，这条道路也在间接酝酿着发展革命的因素。”（《列宁全集》第一卷715页）

同时，列宁在另一篇论文中写道：“革命是一条直接的对人民有利的道路。改良运动通常是缓慢的道路、审慎地、逐渐地前进，而不是倒退。”（《列宁全集》第四卷第576页）那末，康有为的教育思想，虽然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但他确有令人称道和赞许之处，甚至，还能引起后人的崇敬。例如：他坚决主张废除科举制度，这种改良主义的主张，已经酝酿着革命的因素。大家知道，我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自从七世纪初开始，经历隋、唐、宋、元、明、清一千二百多年，到了维新变法的1898年，康有为写了一份《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在这份奏章里，他对科举制的种种弊病，不仅一一列数，又加严厉批判。康有为认为：科举制的最大害处就是“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其结果，就使“人才”变成“学究”，这些“学究”既不懂得世界大势，又不明白国外的文物，而且对自己祖国的历史人物也不甚了了，甚至一无所知。因此，由科举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在这里，人们不难看出，康有为教育思想的先进性之一，就在于首先胆敢全盘、彻底地否定以至痛斥和批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这在清朝的顽固派看来，康有为的言行真是大逆不道，但康有为却作了理直气壮的反驳：“此乃救国良计。”当然，康有为的教育思想还反映了破和立的两个方面：废科举是破，兴学校是立。在1898年7月，康有为写了一份《请开学校折》，在这篇奏章的字里行间，康有为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康有为一再提出，中国的教育制度，应当仿效德国和日本，同时又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以德日为师”。

“并符合国情。”于是，康有为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激情，尽情地描绘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希望在中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教育系统：

各乡设立乡立小学，凡是年满七岁的儿童均应进入乡立小学读书。乡立小学的学制规定为八年，这八年里必须开设的主要课程是：国文、历史、舆地、物理、体育、歌乐。乡立小学的教育阶段是每一个儿童必须接受的义务教育。康有为主张在义务教育阶段，应当带有强制的性质，如果儿童“不入学者，罪其父母。”

各县设立县立中学，凡是年满十四岁的少年可入县立中学求学。县立中学应分设初等科和高等科。初等科和高等科的学制各二年。初等科和高等科应当开设的主要课程是：国文、历史、舆地、物理、体育、歌乐。这些课程名称虽和小学相同，但其教学内容和程度均应增多和加深。同时，还必须注意，初等科和高等科的教学内容，除了系统连贯性，还应分出阶段性。除了以上的这些课程，在中学初等科和高等科都应增加外国语和实用学科的课程。

各县还应设立中等专门学校，如农业、商业、林业、矿业、机器、工程、驾驶等等的专门学校。至于还不具备条件单独设立专门学校的一些县，可以把这些专门学科附设在县立中学里，以便让中学初等科二年制毕业的学生升入专门学校学习，学制是二至三年，以培养一批为各县所需要的中级的各种技术人才。凡是中学初等科二年制毕业的学生，有志深造者，可以升入高等科学习。总之，各县设立的中学，要培养一部分学生可升学深造，也要培养一部分学生能去学得专门技术。

各省设立省立专门高等学校和大学。按照各省具体条件的不同，有的省既可设立各种专门高等学校，又可开设大学。有的省如受到条件的限制，可先设立因地制宜的几种高等专科学校，学制为二年。特殊学科的专门高等学校，学制为三年。大学的学制是四年。大学可分为四种，即：经学；哲学；律学；医学。在京师则设立一所规模宏大、设备完备、师资优良的京师大学，作为全国的榜样。

康有为的设想，确是十分周到的。

后来，1898年的维新变法，虽然只经历了一百另三天而告失败，但康有为的教育理想和主张，却在百日维新时期曾经得到了部分的实现，而且他对学校教育系统的建制和各级学制与开设课程的主张，对近代中国一直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教育是国家的富强之本。

在学校教育中，康有为认为最重要的是德育，因此，他在万木草堂讲学的几年里，不教学生在当时十分通行的四书五经，也不教学生陈腐八股，而是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重点讲研今文经学，从而批判古文经学。他在教学过程中常常从《公羊传》和《春秋繁露》里找出根据，发挥他的理论，以此来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因而，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在《康有为传》的著作中有过这样的一段记述：“……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持重焉。”的确，康有为对体育教育的重视，仅次于德育，却高于智育。康有为明确提出，在小学里应有各种体育活动和各项游戏的设备，不仅要有体操场，还应有游步场。在各项体育活动和游戏的设备中，至少要有秋千、跳木、沿竿。同时，规定体育教育

的主要内容是兵式体操，以兵式体操使学生强身，以兵式体操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以“尚武”精神强国保种，使体育和德育教育两者紧密结合于一体。在康有为的教育思想里，把体育教育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创见，而且，也为以后的“尚武”教育开辟了先河，使得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如蔡元培、章太炎等在爱国社，秋瑾、徐锡麟等在浙江绍兴的大通学堂，都利用学校练习兵式体操组织义勇军来救国。

值得赞赏的是，康有为重视体育教育的思想和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教育主张，几乎完全相同，陈独秀曾在1915年10月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和1917年发表的《近代西洋教育》等一系列的论文中指出：中国封建旧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偏重学生脑部的智力教育，因而就十分严重地忽视了学生身体锻炼的体育教育，致使培养出来的青年人都是“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因而，陈独秀就特别注重以“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而提倡体育教育。这个主张，和康有为完全相同。

在康有为的教育思想里，安排了德育、体育、智学的先后次序和地位。同时，他又主张在智育教育方面，也必须结合德育教育，德智两育不可分割。因此，他在万木草堂的教学过程中，对于智育教育的内容，就选定以自己的论著作为教材。康有为在讲授《新学伪经考》一书的时候，就对当时封建统治阶级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左传》、《逸礼》《毛诗》等等进行了猛烈的评击。康有为曾经向学生指出，这些经典都是西汉末年的刘歆为了迎合王莽篡汉而谬托圣人

制造的“伪书”，这些“伪书”根本无足凭证，完全不可信托。当然。康有为的这种观点和历史事实不符，但是他那种大胆的议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因为他的理论，正是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

康有为在讲授《孔子改制考》一书的时候，他按照自己的政治见解塑造了孔子的形象。在康有为的笔下，又在康有为的口里，把近代资本主义的议院制、国会制等等的政治制度，说成是在实质上早在孔子的预言中已经提出，只是名称有所不同而已。这一点，连鲁迅先生也认为这是康有为的聪明，他打出孔子的招牌，利用孔子的绝对权威，尽情地来宣扬他自己的发展变化的自然哲学观；循环进化的历史观；开明专制的改良主义的政治观。

康有为在讲授《大同书》的初稿时，（《大同书》的正式完稿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侨居印度时的1902年，这部书的最早书名称为《人类公理》。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是《大同书》的未定稿内容。）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东方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以公羊学的神秘历史进化论为指导，根据“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礼运篇》中的“小康”与“大同”的思想结合起来，同时又渗入了佛教的众生平等、基督教的和平博爱、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等等捏合在一起，阐述了自己的变革与发展的观点。康有为明确指出并又预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必然地要经过“据乱世”到“升平世”，然后才能进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之世”。但康有为又指出，中国在当时还不具备实现大同的条件，只能由据乱而升平，因此就必须通过变法争取

达到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

概括的说来，康有为主张的智育教育的内容，“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这显然是封建唯心主义的伦理哲学，但是经过康有为独具匠心的解释，却成了他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并且达到了寓德育教育于智学教育的目的。

应当强调，《大同书》确是一部具有进步意义的著作，也是万木草堂里的一本进步教材，因为在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里，洋溢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平等和自由；充满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欢乐与幸福。康有为描绘了一幅大同世界的蓝图：世上既无贫困，人间也无苦难。这些充满了东方式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正是给当时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是一种最猛烈的批判和最无情的打击。康有为向往着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期望和追求着中国实现美国式和瑞士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康有为认为，在中国要实现这个最高级的理想社会，除了依靠教育的力量，别无他途。所以，万本草堂的学生如陈千秋、曹泰、梁启超、韩文举、徐勤、梁朝杰、陈和泽、林奎、王觉任、麦孟华等人都成了大同世界的信徒，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著作中写道：“后此万本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

我们从中国古代教育史的资料看，子贡和颜回两人，可以说是孔子的最忠实的学生，也是孔子思想的最忠诚的继承者和维护者。但到了中国近代史时期，出现了康有为这个历史人物，他不仅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更重要的却是超越了子贡和颜回的思想境界，因而就能大胆地改造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我们不妨举出一个细小的事例，也能足以证实。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多少年来，大家把这两

句孔子的老话，一直斥责为“愚民政策”的格言。但是，就是这两句孔子说过的话，经过康有为一解释，内容和含意完全起了相反的变化。孔子本来的意思是说：“只叫人民去做什么，不必叫他们懂得其中的道理。”那就是要人民必须盲目地绝对服从。可是，康有为另加了两个逗号，并作了新的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当人民的认识水平达到可以行动的程度时，那就放手让他们去做；如果人民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那末，就用教育的力量好好地教育他们。人们赞赏康有为在为继承、改造和发展孔子思想的过程中，确有他的胆识和创造性的独到之长，他把孔子的“愚民政策”一改而为开导人民、启发人民的教育方针。所以，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康有为的教育思想还是深入人心，而且，连对清朝政府在制定学堂章程方面也有重大的影响和实质上的指导意义。大家都能清楚地记得，现代中国自从1981年起正式实施了学位制，这是按世界各国一般通行的三级学位制，即学士、硕士、博士。因此，人们认为学位制并不起源于中国，其实，根据中国教育史的记载，我国早在清朝末年，已经实施了中国独创的学位制。例如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小学卒业，奖给附生；中学卒业，奖给贡生；高等学卒业，奖给举人；大学分科卒业，奖给进士。”接着，1906年又颁布了《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其中明文规定：“凡在东西各国正式高等以上学堂毕业，回国后须受政府考试，考试成绩列入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试成绩列入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这类考试每年举行一次。因此，在清朝末年实施的四级学位制，即“附生、贡生、举人、进士”，就是根据康有

为教育思想中所提出的主张，各乡设立小学，各县设立中学、高等学，各省设立高等专科学校和大学。因而，按照各级学校毕业，才能授予学位。那末，要是没有康有为所主张设立的各级学校，何能在清朝末年实施四级学位制？

康有为的教育理想确有成为教育现实的地方，例如1901年在南京创办了一所江南蚕桑学堂，这所学校分正科与别科两部，正科的学制为两年，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动物、植物、数学、物理、化学、栽培学、养蚕学、蚕体生理学、气象学、土壤学。别科的学制为四个月到半年，开设的主要课程是栽培学、饲养学等。这所学校还有附设的蚕桑实验场，作为正科和别科学生实验的场地。

自从1901年以后，各省创办了不少农业学堂，例如在河北保定有“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四川成都有“四川中等农业学堂”；山东济南有“山东高等农业学堂”。这些学校的学制有二年制也有三年制，同时又分设了农业科、林业科、兽医科和土木工程科等等。此外，各地的中学里还设立了职业科，以培养中级的专门技术人才。

应当肯定，康有为的教育思想确有具体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例如，他坚持认为教育经费是办好各级学校的根本保证，各县的中学，特别是各乡的小学，每年必须要有固定教育经费的来源，他认为这项教育经费应当列入政府的预算，并须严格执行。同时，他又主张把各地的寺庙庵堂产业和宗祠产业划归给各乡小学和各县中学所有，以充足固定性的教育经费的来源。甚至，把各县文庙的产业，应当首先作为各地学校固定的教育经费。康有为认为，人们每年可以也应当到文庙里去祭孔，但不能以祭孔为名，却以酒肉填饱肚子为